

“子虚”文学史：从赋中人物到小说篇名

王思豪

【摘要】司马相如《子虚赋》以“子虚”为假托人物，托“子”姓而名“虚”，寓含有从契之商，到微子之宋，再到梁国代言人之意，梁园即“子姓之墟”。子虚借由为“楚称”的“虚言”来影射梁王僭礼越制的行为，意图劝谏梁王。“子虚”又引导我们从地理学层面的虚设梁园走向哲学层面的老庄“无为”，以及文学层面的“凭虚构象”的思索。在诗词的世界，因天生具有彰显君臣际遇和崇尚虚静无为的秉性，“子虚”化为盛唐诗人的蓬勃朝气，宋人词中对“大一统”的渴望和知音难觅的悲叹，明清文人归隐山林的一剂触媒，成为儒家积极入世和道家隐逸避世的文人共同的书写对象。在古典文学批评领域，尤其是古典戏曲小说理论中，“子虚”成为品评戏曲小说特色、创设小说人物，甚至直接借为小说篇名的代言人，构成“赋说”与“小说”的直接互渗。自从司马相如创设“子虚”之名起，这个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便开始驱使后代文士的创作，书写属于“子虚”的文学史。

【关键词】司马相如；《子虚赋》；《子虚记》；凭虚构象

【作者简介】王思豪，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澳门 999078）。

【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2024.4.27～3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辞赋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49）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问题的提出

“子虚”之名，出自司马相如《子虚赋》，最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保证文本分析的完整性，现移录如下：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①

可见司马相如自小比较重视起名的缘起和寓意。长大后：

以贤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②

仕宦经历由侍奉天子到客游诸侯^③，相如在游梁时作《子虚赋》。后梁孝王死，相如归蜀，娶文君，至武帝时又逢际遇而得以侍奉天子：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④

《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与《史记》同^⑤。从这段记载，我们认为有关“子虚”的内涵，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虚人”，此与赋中人物的姓名对应，即为何托“子”姓而名为“虚”？二是“虚楚”，此与赋中人物的使者身份对应，即为何托“虚”为“楚”使？三是“虚辞”，此与赋中人物的言辞对应，即为何司马相如的“虚辞滥说”会成为文学虚构的经典之作？“虚人”“虚楚”，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诸侯与天子政治斗争

的文学再现,留给后世称说的是对相如人生际遇艳羡和对大一统王朝的期许;而“虚辞”,则是以文学来言说历史,促使“凭虚构象”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从虚辞到虚构,从历史叙事走向文学叙事,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小说《金瓶梅》中“花子虚”的命名,又如汪藕裳弹词小说《子虚记》等小说以“子虚”命篇的出现,这些都寓含着“子虚”正以其“虚”的存在而被赋予丰富而充实的文学意蕴和文化内涵。

一、“子虚”：“子姓之墟”与梁园代言

子虚,姓“子”名“虚”。“子”姓之源,据董仲舒《春秋繁露》谓“天将授汤,主天法质而王,祖锡姓为子氏”^⑥,原因是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史记·殷本纪》记载更详细:“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誉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⑦契,子姓,名契,别称“阋伯”。契是帝誉与简狄之子、帝尧异母兄,被帝尧封于商(今河南省商丘市),因此成为商族始祖。商,甲骨文写作“𠂤”,字形为一只玄鸟降落于土丘之上,意思是子姓“商族居处之地”^⑧,上古时商丘一带地势多有土丘,即是“虚(墟)”。

契为子姓,《通志·氏族略》亦收载,郑樵注云:“帝誉之子契受封于商,赐姓子。汤有天下,微子基宋,世为子姓,或以为氏。”^⑨成汤践天子位,子姓成殷商的国姓,至周武王立帝乙之子微子启为宋公,奉成汤之祀,并得用天子礼乐。子姓诸侯国主要是宋国,孔子就是殷商王族及其遗族——宋国贵族的后代,本为子姓。近年,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孔子衣镜赋》,谓:“孔子……其先□(宋)□(人)也……姓孔,子氏。”^⑩又,据《孔子家语·本姓解》:“孔子之先,宋之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纣之庶兄,以圻内诸侯,入为王卿士。”^⑪自此,商王逊而为宋公,“子”姓经历了由“王子”的省称到“公子”“君子”的省称^⑫。之后,

《金瓶梅》中的“花子虚”,“花”氏即“华”氏,其先祖亦是微子启,《通志·氏族略第三·宋邑》谓:“华氏,子姓。宋戴公子考父食采于华,因氏焉,世为宋卿。”^⑬东周初,宋戴公之子好父说食采于华,其子孙遂以华为氏。

为何名叫“虚”?“虚”的第一种含义,在于与梁园的结缘。虚,本义为大山丘,即“墟”的本字,《说文》:“虚,大丘也。”^⑭《诗经·邶风·定之方中》:“升彼虚矣,以望楚矣。”^⑮卫文公在楚丘建造宫室宗庙,并与臣子一起登高遥望楚丘。春秋时,楚丘为宋国地楚丘邑,秦置己氏县,属砀郡,治商丘睢阳。睢阳,宋国故城,是周初封微子于宋国的都城。《左传·昭公元年》载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阋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阋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为,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⑯阋伯与实沈兄弟二人不和,帝誉高辛氏将阋伯迁居商丘,让实沈迁居大夏,一南一北,如商、参二星,此出彼没,永不相见。阋伯,就是契,封地在睢阳,所以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宋州宋城县古阋伯之墟,即商丘也。”^⑰睢阳古称商丘、宋国、梁园、宋州等,除商朝、春秋宋国在此建都外,西汉的梁国也都于此地^⑱。

汉梁孝王的兔园,在宋州宋城县东南十里。《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明年,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宋州宋城县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汉之睢阳县也。汉文帝封子武于大梁,以其卑湿,徙睢阳,故改曰梁也。”^⑲睢阳本为西周至战国时期的宋国都城所在地,汉梁孝王刘武始都大梁(今开封),旋即迁睢阳,故梁园即是“子姓之墟”。

以上是从历史地理学上之推理。又,《子虚赋》文本之内亦可提供三重佐证。一是《子虚赋》为何以

“子虚”命名?首先,考察《子虚赋》之前的赋作,无论是《高唐赋》《神女赋》,还是《七发》,其中创设的人物如“宋玉”“吴客”等,皆仅具有个体的性质,而到《子虚赋》中的“子虚”则被赋予诸侯国之使臣身份,肩有使命与职责,富有政治内涵。其次,《上林赋》(或《天子游猎赋》)写天子苑囿“上林苑”,故名有曰“上林赋”,而不称“无是公赋”;《子虚赋》写楚国苑囿“云梦泽”,却不名之以“云梦赋”,而以“子虚”命名,抑或在强调从“契”而来的“子虚”之内涵。

二是在《子虚赋》的末尾,乌有先生驳斥子虚之言,陈述齐国渤海、孟诸可以“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蒂芥”,物产丰富,种类繁多,“不可胜记”,特别指出“契不能计”,又说“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②。这里的“契”字,《汉书》写作“离”,《文选》写作“离”,李善注谓:“张揖曰:……离为尧司徒,敷五教,率万事。”^③契为“司徒”,职责在于“敬敷五教”,《尚书·舜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孔颖达《正义》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亲睦,家内尊卑五品不能和顺,汝作司徒之官,谨敬布其五常之教,务在于宽。”^④又《左传·文公十八年》云:“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⑤契掌管教化,所“计”在于理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伦理关系。《子虚赋》特别点出“契不能计”,或即寓含子虚夸耀云梦而未能理顺五伦关系之意。

三是子氏、乌氏皆以乌为氏。既然子虚是姓“子”名“虚”,那为“齐难”的“乌有先生”呢?“乌”作姓,齐大夫有乌枝鸣。乌枝鸣的身世经历值得注意,他是齐国大夫,又曾戍守宋国,大败华氏,有稳定宋国局势之功,《左传·昭公二十一年》:“齐乌枝鸣曰:‘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彼多兵矣,请皆用剑。’从之。”^⑥杜预注:“乌枝鸣,齐大夫。”^⑦韩愈《乌氏庙碑铭》有说:“乌氏著于《春秋》,谱于《世本》,列于《姓苑》。……在齐有余、枝鸣,皆为大夫。”^⑧关

于“乌”姓之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谓:“出自姬姓。黄帝之后,少昊氏以乌鸟名官,以世功命氏。齐有乌之余,裔孙世居北方。”^⑨少昊氏有“乌鸟氏”,其后为乌氏。乌之余,即乌余,齐大夫,《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二十七年载胥梁带无师擒齐人乌余事。“乌”姓指向齐国,故为“齐难”,亦有维护梁园之意。子虚、乌有,当是司马相如游梁时所著“子虚之赋”中的对话人物,至于“无是公”,则是司马相如面见汉武帝时所写《天子游猎赋》中的人物,是代“至高无上”的天子立言,姑置不论。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子虚所谓为“楚称”,实则为梁园“虚言”的意图。子虚的命意即为“商(子)之丘(墟)”,寓含有从契之商,到微子之宋,再到梁园的代言人之意,而最终借由为“楚称”的虚言来彰显。

二、“拘于虚”:“云梦”诸侯与“上林”皇权之争

“虚”的第二种含义是有局限于区域之意。《庄子·秋水》云:“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虚,郭庆藩《集释》谓“本亦作‘墟’……言井鱼居于所居,故不知海之大也”^⑩。“虚”从“大丘”演变为“一定的范围”之意,前引《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上读《子虚赋》而善之”,召问相如。相如回答称“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意在“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子虚以楚之“云梦”为大,但相对于代表天子皇权的“上林”,亦不过“拘于虚也”^⑪。

梁孝王刘武,汉文帝的儿子,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倍受宠爱而“异于他子”。文帝即位第二年(前178),封刘武于“代”(今山西平遥),过了两年,迁都淮阳(今河南淮阳)。公元前168年,刘武受封为梁王,以淮阳地湿为由,迁都到当时被称为“天下膏腴地”的睢阳(今河南商丘)。发生在梁王身上的事件,有两件值得关注:一是汉景帝一直未立太子,有次与梁王宴饮,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景帝曾言要将帝位传给梁孝王,“太后亦然”,窦太后也欲以孝王为景帝后嗣。二是梁孝王平定“七国之乱”有功。汉初,强大的诸侯王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突出,景帝二年(前

155),御史大夫晁错上疏《削藩策》,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发动叛乱,《史记》载“吴、楚、齐、赵七国反”^⑩。明明是四国,为何说是“七国”?原因在于胶西、胶东、济南、淄川皆由齐国分出。梁孝王据守睢阳,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首功,此后实力大增,成为当时天下最具实力的诸侯国王。梁王经常僭礼越制、有功骄矜,直接威胁到汉王朝中央权威。

梁孝王“最亲,有功,又为大国”,于是“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之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梁孝王入朝觐见时,“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⑪,同车共辇,丝毫不讲究君臣之礼,而且还招揽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⑫纷纷来归。再加上景帝朝,太子之位废立无常,先立栗太子刘荣,后废黜,又立胶东王刘彻,即后来的汉武帝为太子。此时,羊胜、公孙诡“欲使王求为汉嗣,王又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为不可。天子不许”^⑬。梁孝王的皇帝梦被惊醒,怨恨爰盎和参与议嗣的大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谋,阴使人刺杀爰盎及他议臣十余人”。景帝“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案梁事。捕公孙诡、羊胜,皆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安国皆泣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⑭。梁孝王刺杀爰盎等多位朝廷大臣,谋夺储君之位以失败告终。

《子虚赋》为何得到汉武帝喜爱,却未受好赋的梁孝王之青睐呢?回顾司马相如创作《子虚赋》的历程,他是先在景帝身边为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称是“以货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经常陪侍景帝左右,《史记索隐》引张揖曰:“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会景帝不好辞赋”,恰好此时梁孝王来朝见景帝,看到孝王身边有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等人,“相如见而说之”,然后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⑮。据此知,《子虚赋》写作时间,正值梁孝王谋夺储君之位时期,司马相如当有劝谏梁孝王之举,清儒顾炎武亦推测说:“《子虚之赋》乃游梁时作,当是侈梁王田猎之事而为言耳。”^⑯这大概也是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的原因之一。

《子虚赋》中子虚之言,铺陈诸侯王僭礼越制的行为,其实即是在影射梁王,劝谏梁王。梁王的梁园“拟于天子”“多于京师”,多有僭礼越制之举,太史公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于天子。然亦僭矣。”^⑰在用周天子礼的“商之丘(墟)”上营建而成的梁园,在汉代属于僭越礼制,也即是子虚口中称道的“云梦”为高。我们今天所见的《子虚赋》,“楚使子虚使于齐”,子虚为“楚使”,是使臣身份,所以出使专对,需要不辱使命,矜夸“云梦”风物。但《子虚赋》中所言“下属江河”,注引文颖曰:“南方无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谓之河,诗赋通方言耳。”^⑱司马相如此赋中,从南方的楚使子虚口中道出北方之语。又《子虚赋》曰:“于是郑女曼姬,被阿锡,揄纁缟。”李善注引如淳曰“郑女,夏姬也”,指郑国的女子。楚国何来郑女?难怪左思《三都赋序》批评司马相如等赋“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⑲，“云梦”之中多梁园风物。司马相如在写作《子虚赋》之前,经常陪侍景帝之侧,具有了强烈的天子“皇权”意识,对诸侯国与中央皇权的矛盾有了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并没有加入到羊胜、公孙诡之属帮助梁孝王谋夺储君之位的行动中。不仅没有加入其中,还有《子虚赋》劝谏之举,清儒何焯评此赋谓:“相如游梁时,梁孝王好游宫室,作曜华宫,筑东苑,方三

百里,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二十余里。此赋中极眩耀,后则归于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盖所谓以讽谏也。”^④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也或因此得不到梁王的赏识。

从《史记》记载来看,汉武帝在读《子虚赋》之前是没有见过司马相如的,但读了《子虚赋》,且知道司马相如是梁孝王的幕僚,他不仅没有怪罪,而且还“善之”的原因,即在于司马相如把“子虚”之言归结为“此乃诸侯之事”。诚如乌有批评子虚所言“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⑤,在诸侯之位,就不该侈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司马相如是有了皇权大一统的认识之后,再去诸侯之国,后又经杨得意引荐,得到汉武帝赏识。这样的经历,令司马相如更加强化了大一统的主张,以天子之立场来审视诸侯国,代天子宫权立言,《子虚赋》最终表达的是劝诫藩王禁淫守职的意图。

以梁孝王为代表的诸侯王地过古制,《汉书·诸侯王表》对此揭示道:“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⑥到武帝朝,依然如此,主父偃就说:“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⑦公元前140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向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⑧这个说法提出的时间,大致与《天子游猎赋》的创作时间一致,司马相如在赋中也展现出武帝的“尚武”形象和明确的“大一统”意识^⑨。《天子游猎赋》借无是公之口说“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子虚、乌有之言,不过是“拘于虚”的诸侯之事,“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并向天下诸侯发出警示“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⑩,显示出凌驾于诸侯国之上的气势,是天子“皇权”当之无愧的代言人。

三、“虚言”：“无为”与“讽谏”并存的文学艺术

《子虚赋》以一个姓子名虚的“虚人”形象来代言诸侯云梦的“虚楚”存在,最终又都是以“虚言”来进行描摹。“虚言”为何言?我们注意到《文选》中《子虚赋》末乌有先生有曰:“是何言之过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⑪“虚言”即是“言之过”“奢言”“无而言之”;“为楚称”,即是“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有意思的是,《史记》《汉书》在“无而言之”句之前,还有一句“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恶也”,《文选汇评》(何本眉)曰:“‘楚国之美也’下脱‘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恶也’二句,《史》《汉》并有,然细寻,则无此二句为优。”(何本旁):“此转收出‘自虚’二字之义。”^⑫此段异文,我们姑且不去辨析孰优孰劣,但却把我们引向“有”与“无”的思考,从地理学层面“虚楚”的梁园引向哲学层面的老庄“无为”,以及文学层面的“凭虚构象”的思索。

“虚”是老庄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老子·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庄子·人间世》“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⑬,保持虚心,便可容纳万象,凝视无形,无为而无不为。《庄子》中有类似的“子虚”“乌有”的命名,如无名人(《应帝王》),无为谓、无穷、无为、无始、无有(《知北游》),无足、无约(《盗跖》),无何有(《逍遥游》)《应帝王》《列御寇》)。至西汉初,文帝、景帝都推行黄老治术,在梁孝王封地的梁园,黄老之学也非常盛行,据孙少华先生考证,先秦黄老之学“入汉以后,兴盛于齐,其他地区也有流传。梁孝王时,传入梁地的齐文化,最主要的应该是黄老”^⑭。司马相如曾经侍从景帝和梁孝

王,自然受到黄老之学的影响,《子虚赋》借子虚之口有言:“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泊乎无为,澹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⑤楚王恬静、寡欲,行以养生之术,这是典型的汉初黄老思想。司马相如创作《大人赋》谓:“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⑥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总结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⑦《子虚赋》是意在通过“讽谏”而归于“无为”,以儒家之法而求于黄老之术。司马相如的“虚言”,如太史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⑧恭俭朴素,无为而治,这是黄老之学的核心要义,司马迁说司马相如赋“其要归引之节俭”,符合黄老治术与养生学说。但同时,无为又与《诗》之“讽谏”,与“仁”“义”“礼”统一,“虚言”成为“讽谏”与“无为”并存的文学艺术,这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治术在司马相如赋作中相互交融与纠葛的体现。

首先,自老庄哲学层面而言,虚者,空也,无也,引申至文学领域,即是用“虚辞”。《子虚赋》中子虚一出口便是:“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

《文选汇评》俞本眉曰:“出口先将云梦放活一步,妙能用虚。”^⑨“用虚”,是《子虚赋》的特长,扬雄谓:“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⑩“虚”成为司马相如赋的一大特征。自太史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将子虚之辞引向语言功用与文学批评领域。司马迁也说:“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⑪,司马迁所删“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之“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的内容,就是文学的虚辞。班固称司马相如“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讽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⑫,赋予其“辞宗”地位。之后,刘勰《神思》“陶钧文思,贵在虚静”^⑬,讨论“虚”与文思的关系,至清人刘熙载提出“按实肖像”与“凭虚构象”^⑭的文学理论,皆是由赋学“用虚”生发而来。

其次,自儒家思想层面而言,《子虚赋》的“讽谏”诉求以及给司马相如带来的人生际遇的转折,成为后世文学作品歌咏的对象。自左思《咏史》“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始,“子虚”成为文人才华的彰显和个人际遇的表征,这在唐代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全唐诗》为例^⑮:

诗人	诗名	诗句	诗意
宋之问	《故赵王属赠黄门侍郎上官公挽词二首》其一	冥漠辞昭代,空怜赋子虚。	喻指上官氏以作品名世。
张子容	《送孟八浩然归襄阳二首》其二	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借以表示孟浩然无需献赋求仕。
王维	《戏赠张五弟諲三首》其二	染翰过草圣,赋诗轻子虚。	借相如衬托张諲善于诗赋。
钱起	《送集贤崔八叔承恩括图书》	雨露满儒服,天心知子虚。	喻指当朝皇帝重视文才。
钱起	《送沈仲》	举酒常叹息,无人达子虚。	以相如自喻,感叹无人进荐。
李白	《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	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与论文章。	自比相如,冀逢圣主。
崔宗之	《赠李十二白》	双眸光照人,词赋凌子虚。	赞誉李白有卓越的文才。
姚伦	《过章秀才洛阳客舍》	尽是忘言客,听君诵子虚。	以子虚喻指章秀才所作词赋。
卢纶	《酬包佶郎中览拙卷后见寄》	沉忧敢望金门召,空愧巴歊并子虚。	用《子虚赋》作为反衬,自谓所作诗歌不敢与之相提并论。
白居易	《及第后忆旧山》	偶献子虚登上第,却吟招隐忆中林。	用《子虚赋》喻及第。
张南史	《早春书事奉寄中书李舍人》	为报周多士,须怜楚子虚。	借未获知遇时的相如以自喻。
吕温	《道州酬送何山人之容州》	应须定取真知者,遣对明君说子虚。	以相如比喻何山人,希望他早日被举荐于朝廷。
李商隐	《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	几时绵竹颂,拟荐子虚名。	用杨得意荐相如事,希望令狐舍人举荐自己。

温庭筠	《送襄州李中丞赴从事》	汉庭文采有相如,天子通宵爱子虚。	赞李中丞以文才受到皇帝的赏识。
张乔	《题友人草堂》	坚话长如此,何年献子虚。	期待隐居的友人有朝一日向朝廷展露才华,取得功名。
李山甫	《贺友人及第》	春风不见寻花伴,遥向青云泥子虚。	以《子虚赋》代指及第友人的文章。
罗隐	《新安投所知》	少年容易舍樵渔,曾辱明公荐子虚。	以相如自比。
韦庄	《东游远归》	青云不识杨生面,天子何由问子虚。	以相如自比,伤叹朝中没有了解自己如杨得意者向皇帝引荐。
黄滔	《御试二首》之二	词臣假寐题《黄绢》,宫女敲铜奏《子虚》。	以《子虚赋》代指及第文章。
黄滔	《寄越从事林嵩侍御》	子虚词赋动君王,谁不期君入对扬。	称颂林嵩以文才受到赏识。
齐己	《寄钱塘罗给事》	愤愤呕谗书,无人诵子虚。	反用杨得意荐相如事,谓无人向皇帝推荐罗隐的作品。

司马相如才华横溢,写作不朽的《子虚赋》,又有杨得意引荐,得遇明主汉武帝,这是积极用世的初盛唐文人所追求和艳羡的对象,甚至也是中晚唐文人的期许。唐人笔下的司马相如朝气蓬勃、《子虚赋》光彩夺目,大唐的气象无不彰显着炎汉的荣光。

到了宋人笔下,一方面,他们将“子虚”引为知音。李清照《感怀》诗有云:“静中我乃得至交,乌有先生子虚子”^⑧,谢绝宾客,闭门作诗,在独处中与乌有先生、子虚子为知交好友,不愿与世俗同流。辛弃疾《水调歌头》(将迁新居不成,有感,戏作。时以病止酒,且遣去歌者,末章及之)下阕曰:“舞乌有,歌亡是,饮子虚。二三子者爱我,此外故人疏。幽事欲论谁共,白鹤飞来似可,忽去复何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⑨以“子虚”等三人为志同道合的知己,用意与李清照同。另一方面,《子虚赋》所体现出来的“大一统”主题,在南宋渴望光复神州的文人笔下激荡,戴复古《水调歌头》(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上阕云:“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筹边独坐,岂欲登览怯双眸。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敌,西北望神州。百载好机会,人事恨悠悠。”^⑩巧妙地化用司马相如《子虚赋》“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点出“吞云”楼名的来源,同时也激起气吞残虏、光复神州的豪情壮志。刘因《塞翁行》诗有云:“天教陂泽养雁鹜,留与金人赋《子虚》。我来乡国览风土,仿佛挝鼓笛呜呜。胸中云梦忽已失,酒酣怀古皆平芜。

昔年阻水群盗居,塞翁子孙杀欲无。至今遗老向人泣,前宋监边无远图。”^⑪刘因生当宋金末年,亲睹元蒙灭金灭宋的惨局,“留与金人赋《子虚》”,用相如《子虚赋》典故,揭示出辽金相继南侵,国土沦丧,那如云梦般广阔的胸襟已荡然无存,发出故园何年统一的哀叹。

有意思的是,到了明清诗人的笔下,因《子虚赋》而腾达的司马相如不再是他们艳羡的对象,反而成为他们追求闲居、隐居生活的催化剂。王阳明《山途二首》之二:“南北驱驰任板舆,谪乡何地是安居?家家细雨残灯后,处处荒原野烧余。江树欲迷游子望,朔云长断故人书。茂陵多病终萧散,何事相如赋《子虚》。”^⑫贬谪途中的阳明先生,想到了和他一样多病的司马相如,借此曲折表达出归隐的意愿。王夫之《雁字诗》其八:“今古一相如,飘摇赋子虚。玄文披带草,碧个仿林於(簪)。兰叶肥还瘦,银钩蹙已舒。稻粱非汝志,投笔莫欷歔。”^⑬船山先生借在梁园飘摇时期的司马相如写作《子虚赋》自嘲,渴望隐居。吴騞《虚受斋有感》:“零落残编走蠹鱼,西风惊破夜窗馀。绝怜虚受三更月,墙外何人唱子虚。”^⑭虚受斋外本不该吟唱《子虚赋》,空虚其怀之人,当然向往的是以书为伴隐居的生活。苏煜坡《闲居》:“懒上金门献《子虚》,云林深处结庐居。新盟惯订来鸥鸟,旧卷重温走蠹鱼。几本绿蕉朝试笔,一帘红烛夜修书。只惭奇字无多识,门外偏停载酒车。”^⑮以司马相如因《子虚赋》得志为反面教材,

功名非吾事,只愿归与白鸥盟,尽情歌颂闲居生活的欢愉。

在诗词的世界,“子虚”化为了盛唐诗人的蓬勃朝气,化为了宋人词中对“大一统”的渴望和知音难觅的悲叹,也化为了明清文人归隐山林的一剂触媒。“子虚”所代表的儒家入世际遇、用世才华和道家的虚静、无为思想,始终在中国文人的笔下激荡。

四、“审虚实”:赋说与小说的虚构造作

中国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赋学的批评,受到史学传统的影响,主张“祛虚求实”。自左思《三都赋序》对司马相如的虚而不实展开批判以来,《子虚赋》成为文学“过虚”批评的靶子。宋人王十朋《会稽风俗赋》叙曰:

昔司马相如作《上林赋》,设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相答难。子虚虚言也。乌有先生者,乌有是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其词多夸而其事不实……余赋会稽,虽文采不足以拟相如之万一,然事皆实录,故设为子真、无妄先生、有君答问之辞。子真者,诚言也。无妄者,不虚也。有君者,有是事也。以反相如之说焉。^⑦

虚者,与实相对,王十朋以“实录”为号召,指摘相如赋“词多夸”“事不实”,于是将赋中人物命名为“子真”以对应“子虚”,“无妄”对应“乌有”,“有君”对应“无是公”,以反“相如之说”。

这种观点到了明代文学批评家眼中,有了很大转变。胡应麟认为司马相如“创撰子虚、乌有、亡是三人者,深得诗赋情状,初非以文为戏也。后之君子,方拘拘核其山川远近,草木有无。乌乎,末哉”^⑧!旷荡虚无,是诗赋固有的情状。郝敬更在“诗境”之外提出“辞赋境”一说:“《子虚》遁宕,无扬雄艰苦之态,无左思重赘之累,洋洋洒洒然。情与文称,尚觉情溢于辞表。叙山川草木,鸟兽渔猎,种种行乐,语不多而兴致勃然,所以为赋家之正始也。盖辞赋有天则,辞境虚而太虚则浮,赋境实而太实则笨。”^⑨称颂《子虚赋》是“赋家正始”,认为辞赋创

作的“天则”是要虚实相宜。谢肇淛又将这一理论引入戏曲小说领域,谓:“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⑩清代戏曲评论家李渔提出“审虚实”的主张:“实者,就事敷陈,不假造作,有根有据之谓也;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无影无形之谓也。”^⑪“审虚实”是“赋说”与“小说”共同关心的话题。

“赋”是与“说”结缘最早的文体,《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司马相如赋作多“虚辞滥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⑫;《后汉书·杨赐传》载杨赐给汉灵帝上书所说“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驩兜、共工更相荐说”^⑬,这些“赋说”其实都有了后世“小说”的因子,所以钱钟书先生提出“汉赋似小说”,郭绍虞先生提出赋“实为小说之滥觞”的观点^⑭。具体落实到“子虚”元素对戏曲小说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以“子虚”来品评戏曲小说。宋人周密《齐东野语》论“开运靖康之祸”谓:“然考之五代新旧史,初无是说,安知非托子虚以欺世哉?”品评《封神传》云:“子牙即九良星,邓九公青龙星,邓婵玉六合星,土行孙土府星,黄天化即炳灵公,俱属于虚。”^⑮清人此类论述就更多了。清初黄景仁观《金缕曲》(观剧,时演《林冲夜奔》)而曰:“姑妄言之矣。又何论、衣冠优孟,子虚亡是。”^⑯孔尚任《桃花扇·凡例》也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⑰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五《滦阳消夏录五》记载了一个儒林士人耽于男色的故事,谓:“然其事为理所宜有,固不必以子虚乌有视之。”^⑱近人也常以“子虚”批评戏曲小说,钱静方《小说丛考》称:“《牡丹亭》事,子虚乌有,以杜宝为工部之孙,梦梅为柳州之孙,郭驼为橐驼之孙。工部、柳州、橐驼,信有其人,然不闻杜、柳两家,其后裔结为婚媾也。余意杜也、柳也,皆系草木之名,橐驼又系种花能手,此盖美人

香草，藉景言情，非事实也。”^②自有戏曲小说之名目以来，“子虚”就始终存在于其评论之中。

二是“子虚”直接成为戏曲小说中的人物名。明代徐野君杂剧《春波影》（《盛明杂剧》之一）中人物冯子虚，杭州人氏，花花公子形象。清溪道人著《禅真逸史》中有玉华观道士杜子虚，字伯实。道士可有诸多名称，因其不像和尚那样剃发，去嫖妓时，不易被人认出，故可称“嫖头”，因道士嫖妓时会竭力满足妓女的性欲，故又称“花里魔王”，因此，杜子虚可装扮成儒者去妓馆嫖娼。《金瓶梅》中的花子虚就更有名了，他的“花子虚”之姓名，即有多重意涵：一是前揭“花（华）姓”亦是微子启后裔，“华姓”源自宋戴公之孙华督，他杀死大夫孔父嘉，夺其妻据为己有，并杀死宋殇公，花子虚以“花”为姓，寓示因果报应；二是花太监之侄，是花太监的替身；三是娶妻李瓶儿，李瓶与花虚相对，花本在瓶中，但花子虚偏宁愿去妓院也不愿麻烦李瓶儿；四是整日花天酒地，引起妻李瓶儿不满，西门庆乘虚而入；五是气病而亡后，仍不时出现在西门庆、李瓶儿的睡梦、病呓中，作为一条虚线贯穿于小说始终。到《红楼梦》中“甄士隐”“贾雨村”的命名，又何尝不是“子虚”式人物？哈斯宝评《红楼梦》曰：“文章有主客之法。甄士隐、贾雨村，是全四十回的大客。甄士隐，就是‘真事引’，又可释为‘真士隐’。贾雨村，就是‘村假语’又可释为‘假语存’。……这两人是后文中甄贾两大世家的客身。”^③而《红楼梦》书中一极大之关目“太虚幻境”的构设，以及“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一僧一道”等虚幻人物的设置，都离不开“子虚”的影子。虚与实、真与假，是辞赋与小说人物命名共有的旨趣。

三是以“子虚”为小说篇名。最有名的就是汪藕裳的弹词小说《子虚记》，汪氏是晚清女性小说家，她自叙创作命名缘由曰：“作者劳心非一日，造言原自笑荒唐。只图闺阁知音赏，窗下生涯笔底忙。……

子虚本窃相如意，是是非非尽渺茫。以此为名堪晓得，前朝有甚马牛羊？”^④明确说自己《子虚记》篇名源自相如《子虚赋》。其兄汪祖绶为《子虚记》作序说：“《子虚记》者，为吾藕裳三妹所作，事由意造，语出心裁，其名为‘子虚’者，则骋词于风云月露之中，寄兴于儿女英雄之列。”其弟汪祖亮题词有曰“笑他笺注老虫鱼，别构乾坤著《子虚》……咄咄书空成怪事，浪抛心力拟相如”，其弟汪祖鼎题词有曰“欲从千载争坛坫，作记何嫌拟《子虚》”，其侄汪瑞曾题词有曰“寓言托始相如赋，漫演空花了世缘”，其侄汪瑞高题词有曰“梦中应食茂陵书，绮丽缘情托《子虚》。漫说绛仙才调好，清名犹愧女相如”，其侄婿朱定基题词有曰“莫怪荒唐说《子虚》，清才合让女相如”，等等^⑤，皆称说汪藕裳才比相如，《子虚记》虚构笔法、寓言设置皆拟托于《子虚赋》，所以李灵年先生指出：“一般弹词作品，大都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因由，而《子虚记》纯属虚构。它假托明孝宗（弘治）朝为时代背景，以文府为中心，裴府为陪衬，展开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⑥《子虚记》在情节虚构、绮丽辞藻、体物缘情等方面，尤其是“但那见”中语，皆用赋体写就，正如汪藕裳自己所说“窃相如意”甚明。

此外，还有民国期间的文言短篇小说，如纳川《子虚子说比王假道》，假借“子虚子”之口，以“三家分晋”典故喻示当时比利时应该“弃中立之小节，免覆亡之巨祸”，但比王不听，子虚子叹曰：“比其沼乎？在此役也，德不更举矣。”这是一篇游戏之作，是“取《左》《国》之精华，作游戏之三昧。俊辩痛快，无复滞碍。其纵横家之苗裔欤。惜乎，比王之不用其说也”^⑦。可谓是近代新《战国策》。又有缪莲仙《乌有子虚列传》，写处洪荒之世，居无何有之乡的乌有先生与子虚子游，二人皆“性疏旷，以天地为逆旅，万物为刍狗”^⑧，初不欲以名见，等到无怀氏兴，三顾茅庐，委以重任，二人征战沙场，建功立业，被封为邯郸郡

王、华胥国公,但二人视功名富贵如浮云,遁迹方外,分别自名为元元道士、空空和尚。这篇“子虚传”情节取材于司马相如《子虚赋》、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红楼梦》等名著,是“赋说”与“小说”结合的范例。

结论:作为文学史书写的“子虚”

文学史的书写,不仅要关注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应关注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如何影响和指导后续文学作品写作。自从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创造出“子虚”这样的文学人物,他就开始在不断地指挥文人的创作,书写属于“子虚”的文学史。

首先,子虚作为一个“虚人”的存在,寓意“子姓之墟”,假托为“梁园”的代言人,被赋予讽谏的政治功能,揭示诸侯服从于“皇权”的“大一统”认识。李白在“子虚”的驱使下,写作了《大猎赋》,序中指出:“《子虚》所言,楚国不过千里,梦泽居其太半,而齐徒吞若八九,三农及禽兽无息肩之地,非诸侯禁淫述职之义也。……但王者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则天下之山林禽兽,岂与众庶异之?”^⑧“子虚”成为诸侯势力的一个代表,凡是要伸张天子气象时,子虚难逃被讨伐的命运。

其次,子虚作为司马相如得到天子赏识的媒介,成为人生际遇的代言人,驱使着作家创作属于自己的人生知遇的《子虚赋》。这在唐人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前文已有揭示。宋人如王安石“闻多望士登天禄,知有名臣荐《子虚》”^⑨,明人如吴应箕“圣明宵旰须才急,应见飞扬颂《子虚》”^⑩等,亦是期待得遇明君,一展胸中抱负,但这种意愿似乎都已不及唐人来得热烈。

复次,子虚诞生于黄老思想风行的汉初时代,无疑天生具有“虚静”“无为”的秉性,成为隐逸人士的代言人,这在明清之际的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子虚成为儒家积极人世和道家隐逸避世文人共同的书写对象。

最后,子虚走向文学批评的领域,成为与“实”相

对的“凭虚构象”的文学批评术语,直接指导文学作品的创作。尤其是在小说戏曲作品中,子虚成为品评戏曲小说特色、创设小说人物,甚至直接借以为小说之篇名,小说作者自觉以赋法创作小说,构成“赋说”与“小说”的直接互渗。

注释:

①《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9页。

②《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2999页。

③按:参与梁园之游的文士,最主要者有枚乘、司马相如、邹阳、庄忌、公孙诡、公孙乘、羊胜、路乔如以及韩安国等人。其中韩安国本是梁国人,枚乘、邹阳、庄忌从吴国来,公孙诡、公孙乘、羊胜是“山东之士”,只有司马相如从京城长安而来。

④《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02页。

⑤关于《子虚赋》《上林赋》与《天子游猎赋》的分合问题,跃进先生认为:“《史记》中所说的《子虚赋》,作于游梁时期,似为初稿;而《上林赋》则在此基础上加上天子游猎的场面,加工润色,遂成定稿。因此,这是一篇完整的作品,可以称《子虚上林赋》,亦可以简称《上林赋》。”(跃进:《〈子虚赋〉〈上林赋〉的分篇、创作时间及其意义》,《文史》2008年第2辑,第8页)司马相如入梁后作《子虚赋》,其中当有赋中人物“子虚”,“乌有”或亦有,“无是公”当无。

⑥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12页。

⑦《史记》卷三《殷本纪》,第91页。按:姓可能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氏大约出现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阶段,氏多用来区分社会地位的贵贱。参见黎若楠等《浅论古人的姓、氏、名、字、号、爵、谥》(《汉字文化》2022年第11期)一文相关论述。商族传至契,开始向父系始祖过渡,所以《殷本纪》契以下的世系开始按父辈排列。

⑧王玉哲先生认为:“甲骨文的‘商’字……代表他们所崇拜的鸟图腾……是商族用以称呼自己的族名。后人就把商族居处之地,也名之为‘商’了。”(王玉哲:《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66页)

⑨郑樵:《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9页。

⑩按:赋文字内容释读,依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意乐、徐长青、杨军、管理四位学者所刊之文《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载《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第64页。

⑪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234页。按:“孔”这一姓氏的获得,与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有关。《孔子家语》又说:“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

⑫洛地《子,天下第一姓》谓:“春秋时期,子姓的宋自不必说,有‘子皮、子鱼、子灵、子罕’等,姬姓族诸国,鲁有‘子家、子羽、子反’等,卫有‘子贡、子嘉、子适’等,郑有‘子都、子仪、子华、子产’等,姜姓之齐有‘子之、子息、子雅’等,妫姓之陈有‘子夏、子黄、子招’等,包括‘蛮夷’的芈姓之楚亦有‘子木、子重、子囊’等。”是以子为氏(《国学》2017年第2期,第60页)。

⑬郑樵:《通志》,第457页。

⑭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66页。

⑮《毛诗正义》卷三《邶风》,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66页。

⑯《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一“昭公元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93页。

⑰《史记》卷三《殷本纪》,第92页。

⑱按:王国维先生《说商》一文谓:“古之宋国,实名商邱。邱者,虚也。……杜预《春秋释地》以商邱为梁国睢阳,又云‘宋、商、商邱三名一地’,其说是也。……商之名起于昭明,讫于宋国,盖于宋地终始矣。”(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3-264页)

⑲《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2-2083页。

⑳《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15页。

㉑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122页。

㉒《尚书正义》卷三《舜典》,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4页。

㉓《春秋左传正义》卷二〇“文公十八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042-4043页。

㉔《春秋左传正义》卷五〇“昭公二十一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558页。

㉕《春秋左传正义》卷五〇“昭公二十一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557页。

㉖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96页。

㉗《新唐书》卷七五《宰相世系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63页。

㉘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65页。

㉙按:在先秦两汉的辞赋作品中,同是主客问答体,仅《七发》《子虚赋》(或《天子游猎赋》)中以诸侯国人的身份代言,这是与《高唐赋》《长杨赋》《两都赋》《二京赋》不同之处,盖也是汉初诸侯王国与中央皇权矛盾的一种彰显。

㉚《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2页。

㉛《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4页。

㉜《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3页。

㉝《汉书》卷五一《贾邹枚路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53页。

㉞《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第2210页。

㉟《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2999页。

㊱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40页。

㊲《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9页。

㊳《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列传》,第2536页。

㊴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74页。

㊵赵俊玲编著:《文选汇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82页。

㊶《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14-3015页。

㊷《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第394页。

㊸《汉书》卷六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2802页。

㊹《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

㊺参看许结:《武帝旌旗在眼中——汉赋的武帝书写及其省思》,《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14-21页。

㊻《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16页。

㊼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2页。

㊽赵俊玲编著:《文选汇评》,第181页。

㊾《庄子》第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⑤⑩孙少华:《“皇权”与“不死”——汉赋早期两大文本主题与“梁园文学”之兴起》,《文史哲》2021年第1期,第120页。

⑤⑪《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14页。

⑤⑫《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56页。

⑤⑬《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317页。

⑤⑭《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73页。

⑤⑮赵俊玲编著:《文选汇评》,第176页。

⑤⑯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702页。

⑤⑰《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3页。

⑤⑱《汉书》卷一〇〇《叙传》,第4255页。

⑤⑲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93页。

⑥①刘熙载《艺概·赋概》:“赋以象物,按实肖像易,凭虚构象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9页)

⑥②范之麟、吴庚舜主编:《全唐诗典故辞典》,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191页。按:表中诗文皆出自此书,不再赘注。

⑥③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⑥④辛弃疾著,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83页。

⑥⑤戴复古:《戴复古诗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5页。

⑥⑥彭黎明、彭勃主编:《全乐府》,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页。

⑥⑦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6页。

⑥⑧王夫之著,朱迪光笺注:《夕堂戏墨笺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页。

⑥⑨吴騫:《吴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2页。

⑥⑩苏煜坡著,李寅生、周生杰校:《萃益斋诗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88页。

⑦①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20页。

⑦②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

126页。

⑦③郝敬:《艺圃伦谈》卷三,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2895页。

⑦④谢肇淛:《五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47页。

⑦⑤李渔:《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⑦⑥《史记》卷一三〇,第3317页。

⑦⑦《后汉书》卷五四《杨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80页。

⑦⑧参见王思豪:《情事互文:汉魏辞赋与小说的参体同构》,《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⑦⑨周密:《齐东野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1、218页。

⑦⑩严迪昌编选:《金元明清词精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70页。

⑦⑪孔尚任著,云亭山人评点:《桃花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页。

⑦⑫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⑦⑬钱静方:《小说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90页。

⑦⑭黄霖、蒋凡主编,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晚清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⑦⑮汪藕裳:《子虚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24页。

⑦⑯汪藕裳:《子虚记》,第1-4页。

⑦⑰李灵年:《长篇弹词〈子虚记〉初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41页。

⑦⑱纳川:《子虚子说比王假道》,《余兴》1917年第25期,第18-19页。

⑦⑲缪莲仙:《梦笔生花》前集,1935年大达图书供应社印本,第14-15页。

⑦⑳詹鍈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825-3829页。

㉑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第5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99页。

㉒吴应箕:《吴应箕文集》,合肥:黄山书社,2017年,第478页。